

往事並不如煙系列

總策劃：潘耀明

執行策劃：彭潔明

主編：章詒和

北大一九五七

張元勳 著

責任編輯：陳佩森

封面設計：李錦興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初版

ISBN：962-8871-51-X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發行

香港柴灣嘉業街18號明報工業中心A座15樓

TEL：2595 3215 FAX：2898 2646

<http://books.mingpao.com/>

e-mail: mpp@mingpao.com

新加坡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承印

二、「五·一九」的誕生

「五四」過去了，《紅樓》編輯部裏逐漸感受着一種離情，編委會內與編委會外的一些作者，都臨近畢業，於是舉行一次聯歡活動的構想乃應運而生，方案很快就擬定：遊園！當然是頤和園。時間只能是在星期天，乃確定在五月十九日。

五月十九日那天，春光明媚，氣候宜人，確實是興致最濃。我們一早就從北大西校門口乘「32」路公交車到頤和園，十張入園券共一元五角，入園沿知春亭向北，走長廊至排雲殿，登佛香閣至智慧海，到後山，沿蘇州河從後門出頤和園，而後乘車返校，抵北大已是下午五點多。

那天下午，我們在由西校門走回宿舍的路上，看見學生大餐廳的東門外人群輻輳，引頸張望，交頭接耳，神色異常。原來東門南側的牆上出現了大字報：一張半開的粉紅紙上稀稀落落的字跡，堪謂「春蚓秋蛇」，觀其所言，實極簡單：

「青年團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清華有代表，北大有沒有？如果有，是誰？是誰選的？他能不能代表我們的意見？」

歷史系一群團員和青年

猶如一聲極不和諧的音符，毫無疑問，如此敢冒不韙的嘗試起碼說是不會給這「一群」冒險者贏來獎章



北大《紅樓》編輯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遊覽頤和園留影在知春亭畔，此照片由林昭拍攝。前排左起：任彥芳、張鍾、康式昭、謝冕、張元勳（戴帽者）、李任、薛雪。後排左起：杜文棠、王克武、孫克恒。

或稱讚，但它終被後來名之為「五·一九」學生民主運動」的「第一聲槍聲」！而這個「歷史系一群團員和青年」的署名者，其實乃是歷史系三年級的學生許南亭自己。他爲此形若兒戲般的「挑戰」所付出的代價是十二年有期徒刑及其後的漫漫「人民之敵」的苦難歲月，他那強壯的體魄，在二十三年的荒原流放中消瘦如柴、頭童齒豁！目茫視，唇顫嗟嘆。他也與「五·一九」的所有罹難者一樣：輕信與輕率致令之運逢滅頂！

此時，就在大餐廳的東門外牆上還有一張小字報，是十六開的白紙，鋼筆的字跡則極潦草，其標題爲：《一個大膽的建議》，大意爲：建議將這面牆壁開闢作爲一個「民主園地」，以供同學們暢所欲言地發表意見、助黨整風之用。署名爲「哲學系龍英華」。

這位直書己名者的首次亮相，表現出異於前者的無畏與坦然。這應算得上「五·一九」學

生民主運動」的「第二聲槍聲」。

而緊踵其後，在其北側又一張大字報赫然張布，標題則為《我們的建議》，列出四條主張，望之不似文章，卻似宣傳口號：

- 一、取消黨委制，實行民主辦校；
- 二、取消政治課必修制；
- 三、取消留學生內定制，實行平等競爭的選拔制；
- 四、開闢自由論壇，確保言論、集會、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署名皆以「五四〇一」為始的四個學號，意味着是「五四級」的數學系（〇一）的學生。張貼未久，便弄清他們是張景中、楊路、陳奉孝、錢如平。他們的如此「悖論」當然比那前面的「槍聲」還要充滿「烈性」得多。這應是「第三聲槍聲」。

這是一九五七年的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學的一個最為通常的星期日的下午，如「陽關三疊」之「笛為之裂」，三聲「槍聲」打破了燕園的寧靜與溫柔。恰值晚間開飯時間，人流匯集，湧動潮興，觀者輻輳，疊肩如堵，足音雜遝，蹙然遠近。所有的人都靜聲而望，頗懷驚恐與惶然，日漸昏晚，人群已如起伏的黑潮，凝結成漸覺無際的浮動的死海！整個燕園墜入一種不祥的激動，乃如那「死海」的浮動着無聲，預示着「山雨欲來」！

我回到宿舍未久，一人推門而入，這就是繼「張、楊、陳、錢」大字報之後次居「第四」的短詩《是時候了》作者之一的沈澤宜，——我的大學時代的摯友。他說：「大飯廳東門外有人貼出了大字報，咱們聯名

合寫一首詩吧！」邊說邊取出他已寫好的成稿。（這就是後來由他執筆抄寫於大字報的前半首，我湊成的十餘行，他抄於其後，便是後半首。）

於是抄畢，共兩張粉紅色的標語紙，墨蹟尚濡，與我同室的吳允祉學長自外而入（當時我住30齋二〇一室，《是時候了》抄寫於此）。他年長於我十歲，共產黨員，待人真誠。他略瀏覽，思之為問，向我說：「再慎重些！」其時，我們都激動異常，似已無暇旁顧，便與沈澤宜人捧一張，逕至大飯廳東門外，貼於其南側牆上。

非常巧合，那天在大餐廳裏正舉行一個全校性的大會，是黨委的副書記崔×作報告，天氣已暖，已無涼意，在餐廳外的廣場上坐滿了聽報告的學生，於是貼大字報的牆下便被人漸漸圍滿，日色已暗，許多人用手電筒照着，注意地讀着那用粉紅色的標語紙毛筆大字寫成的詩行：《是時候了》。

大約晚上十點鐘，大會結束，同學們走出會場，大餐廳東門外的人更多了，最後甚至擁擠着，手電筒的光束從遠遠近近一齊投向那張「大字報詩」，有人捧着小本子在抄，還有閃光燈及拍照的聲音。

午夜以後，校園內聲籟俱息，可是，在許多宿舍裏，燈光卻是徹夜地亮着：自發的爭論開始在每個宿舍裏展開，大字報也開始在更大的學生群中蓬勃湧現。

大字報，在至今知名於世的「北大三角地」迅速展延，一夜之間，所有的牆壁上幾皆糊滿，猶如半個月前的那一片熾紅的火的山、海，與那春潮帶雨般的詩的風、雨並至，釀成了一九五七年的紅色的五月、黑色的六月、灰色的七月！

次日上午，大餐廳東門外人集如海，燕園的靜謐打碎了！圍觀者之間，開始出現了針鋒相對的爭論、以

至爭吵！《是時候了》的左右上下已被新寫的大字報貼滿，儼若一個圍殲之陣，而其中當以《我們的歌》最

為勁旅，全詩如下：

我們的歌

一

我們支持

民主牆的重新出現

多一個講台

讓上下左右

交換意見

我們絕不堅持

這方式

「最」好

「最」完善

但是我們確信

它可以成為

理想方式的

不理想的

補充手段

二

我們

不同意

「是時候了」的基調

那聲音

彷彿是白毛女伸冤

我們

在共產黨的關懷教育下成長

和昨天相比

我們的生活

無比溫暖

我們愛黨

甚於愛親娘

為着黨的事業

我們情願

獻出

全部的青春、才能、熱血
正是因為愛

所以不容忍她的缺點

為什麼

高聲疾呼着

「急雨」

為什麼

不能用

「柔和的調子」

真理的力量

並不在於

「真理揭示者」

姿態的

瘋狂

假使我們愛黨

首先想到的

就會是

效果

而不是

醉心於

歌斯底里式的

手段

三

「是時候了」的作者

請原諒

我們的歌

你們也許覺得

不像是

「放開嗓子唱」

我們也難於接受

你們舉起的

「火炬」

儘管你們自己宣稱

它的火種

「來自五四」

我們的曲調之間

不太和諧

可也難怪

我們缺乏

你們那根

「沉重的琴弦」

我們

並不像你們

經常「在背地裏

不平、憤慨、憂傷」

要放火嗎

我們

也不打算

「是時候了」

要嚴肅地想一想

應該怎麼樣

正確地

幫助黨

尾聲

「是時候了」的作者

請原諒

按照你們的處方

這歌聲裏

有小小的「急雨」

半場

請問

感想怎樣

江	楓	史林貴	任平	孫東海	何煦昭
利榮忠	周鴻書	徐邦達	許棟樑	曹念明	
張星	張志華	張繼國	張虎生	張祖彬	
蔡長發	楊書棠	薛養玉	錢咸生		

五月十九日深夜

這是江楓獨撰（上列作者的名次本以姓氏筆劃為序，「江楓」之「江」以六劃而列於五劃的「史」字之

北大一九五七年時的林昭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林昭攝於頤和園大門外之銅獅座上。照片背面有同班同學呂凌柯題字：「貓與獅」。

前，乃是江楓執筆的確證）麇集聯名之作！應稱得上是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學反擊「右派」的「第一聲槍聲」。

正當此時，一個瘦弱的女學生把三頁粉紅全開標語紙貼於「我們」之側，那十分娟秀的墨蹟洋溢着女性的禮節性的述說，使人如聞娓娓友情的話語。那題為《這是什麼歌》的洋洋八十行長詩，竟被當時正在中文系讀書的韓樂群同窗悄悄全文錄下，並注：

「林昭於二十日深夜寫出此詩，凌晨貼於東牆。《我們的歌》作者發表聲明『休戰』，一場詩的論戰至此告一段落，林昭亦以此詩罹難，不亦悲乎！」

林昭的詩中有以下詩句：

我，

（並且

還不只我一個）

指責這種凌人的盛氣，

……

為什麼

非得搬出

這麼一大堆

嚇得壞人的名詞：

「瘋狂」、「歇斯底里」……
幾乎就差一句
「反革命分子」！

凜然之聲，今猶可聞！

就這樣，正當《是時候了》弄得滿園春亂的時候，在大餐廳東門外對面的1齋北牆上又出現了一張大字報，題目竟匪夷所思地自稱為《一株毒草》。那是一張黃色標語紙，毛筆字寫得很差，字密而小，貼於高處，仰視之十分吃力。全文如下：

到現在為止，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離我們無知的青年還有十萬八千里，我們國家沒有檢查制度，可是一切報刊（例如《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和物理學報》）的編輯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絕對無知，對辯證法的一竅不通和他們的形而上學的腦袋中裝着的無限的愚蠢，就是一道封鎖真理的萬里長城，比方說吧：

一八九五年以後，馬克思主義按照鐵的必然性轉化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與此相適應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形成相互滲透的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六十二年的絕對統治，而「再論」都把它歸結為「人們的思想情況」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義又是什麼（詳細論證情況請見哲學教研室印「教條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一文）。

魏巍寫的「春天漫筆」不僅空空洞洞的自相矛盾，而且簡直是神經錯亂，語無倫次，卻被採納

為關於「徐進問題」討論的最後批判書。

充滿了極端盲從迷信詭辯，謬誤牽強附會彌縫手段（或者叫作新穎觀念）的物理學已經面臨毀滅，無恥的李政道楊振寧剝奪了物理學的最後一點光彩，可是物理學報還在搞什麼薄板和圓柱，再不就是什麼耗損。

這一切已經完全不堪忍受。

我建議：

（1）讓我們北大學生自己創辦一個綜合性學術刊物。

（2）建立一個學生講座，讓我們向世界證明除了那些一般地禁止自己思維的「三好學生」（或叫白癡，或者優秀生、或者叫「小螺絲釘」反正一樣）以外，中國青年還有的是成千上萬「才子佳人」，他們堅韌果斷才氣橫溢光芒四射，他們將使國際資產階級吃飯時丟落刀子。

你凝了一下眸

你微微一笑

你目瞪口呆

你緊鎖雙眉

你咬牙切齒

你點一點頭。

一切都很好，只是千萬不要發神經病，應該改一改那種聽到一句不習慣的話，就本能地反對哪

種條件或無條件反射，要不我說西郊公園比北大對你更合適，好，再見！

一個「強壯而又懷有惡意的小夥子」

——譚天榮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

這篇短文發洩的不過是一個被退稿者的對於編輯們的憤恨之情！文中透露：那篇由「哲學教研室印刷的《教條主義產生的歷史必然性》一文」是一篇「屢寄屢退」之作，「傑作」遭「貶」，於是「一切報刊（例如《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和《物理學報》）的編輯們」（看來，他投寄的即此三家！）便成了「絕對無知」、「一竅不通」與「無限愚蠢」的了！這些刊物就變成「一道封鎖真理的萬里長城」。（這一點，他在《救救心靈》中則有點「實話實說」：「我曾寫過各種稿件，給各式各樣的報刊和名人，大都石沉大海。」）

那麼到底是什麼「真理」美而見棄的呢？就是那「一八九五年以後，馬克思主義」的「必然性轉化」云云！

該文的第二段是其要旨與精髓之所在，它認為，自恩格斯逝世的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的六十二年間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理論，其實已非馬恩的原教旨意的「馬克思主義」，而是被列寧、斯大林修正後的「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的「相互滲透」，而且這種所謂的列寧主義其實已形成「六十二年的絕對統治」。換言之，自一八九五年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已偏離馬恩原旨，而走向唯心主義的邪路。在中

國連續公之於世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及《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文則是如此唯心主義理論的「赤裸裸」的表現。

似此膽敢對據說由毛澤東親自執筆而成的「兩論」的公然挑戰，真堪謂「膽大包天」！

這些偏激的語言，致令一日之間「譚天榮」這個名字便譽滿燕園，於是，猶如又闢「第二戰場」般地那裏又匯聚出一片新的「浮動的海」。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論點其實乃是南開大學歷史系的著名教授雷海宗先生的見解。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第七版以全版版面刊登了「天津的教授們關於『百家爭鳴』的發言」，其中，雷海宗先生的發言倍受重視，《人民日報》還專為其加以標題及「編者注」，摘引如下：

「社會科學需要不斷發展，但是馬克思主義『還停留在一八九五年的地方』。

「社會科學（包括歷史學）有一個根本問題：社會科學是隨着資本主義產生而產生的，是到資本主義社會才成為一種嚴格的真正的科學；馬克思恩格斯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基礎上用新方法和新觀點為無產階級建立了新的社會科學。

「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樹立的新的社會科學的看法，大家在理論上是一致的，承認馬列主義應該發展，可是實際上是停止了發展，還停留在恩格斯死時一八九五年的地方。一八九五年以後，列寧斯大林在個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但他們主要談當前革命問題。從瞭解整理幾千年來人類歷史經驗，建立新的社會科學來說，基本上停留在一八九五年。教條主義者就是這樣。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經常修改他們的學說，他們注意到當時每一個社會科學部門的發展情況，掌握科學研究的材料

和成果。可是以後人們就認為他們已解決了一切問題，社會科學不能再發展了。事實上並不如此。一八九五年以後社會科學上新材料很多，對舊材料有很多新的認識。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把一八九五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課補上。這不是那一個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問題，工作艱巨得很。解放以前對資本主義社會科學已經不是全面掌握，最近新訂了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刊物，好多問題就不瞭解，看不懂。資本主義國家有些社會科學家是反動的，如凱恩斯，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但今天也有許多資本主義社會科學家並不是有意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有的只是一個認識問題，不直接牽涉到立場，只是對材料的分析研究不同。當然，分析到最後，任何一個社會科學家都是有立場的。另外歷史問題如希臘史，六十二年來發現了好多材料。一八九〇年在埃及發現的雅典憲法，可以說明好多問題。這本書恩格斯未看到，他如果看到，他在『家族、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在有些問題的提法上就會不同。社會科學是需要不斷發展的：在理論上大家都這樣說，在實踐卻認為社會科學停留在一八九五年的了。」

「編者注：雷先生認為社會科學需要不斷發展，而為了發展社會科學，這就需要反對教條主義，這個意見無疑是正確的。但是雷先生認為列寧對於馬克思主義只是『在個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馬克思主義『基本上停留在一八九五年』，這卻是違反了事實。……」

這篇發言，以其報載時間為四月二十二日早於《一株毒草》，故譚天榮實已讀過，而且也曾專赴天津對雷先生作了一次專訪，這「底裏」在他的《第二株毒草》中就不慎洩露，文曰：

「在南大我訪問了歷史系教授雷海宗先生，在我看來，教授們總是淵博而謙遜的，淵博，這就

是說什麼也不懂，謙遜，就是什麼也不想懂，這似乎是一個法則，這一次我畢竟遇到了一個例外，雷海宗教授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對於我簡直是奇跡，他對我說在這種哲學界無限混亂的時期，注意『自然辯證法』、『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兩本書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別是必要的。這句話有多大份量啊。但是據我所知，他關於『一八九五年以後馬克思主義陷入停滯』的說法，被《人民日報》編輯部按了一按，希望大家討論（或者叫作討論，或者叫作圍剿反正一樣），聽說因為毛主席生氣了，這場戲才沒有開演，一切沒落階級的鬼祟和狡猾伎倆，《人民日報》都差不多用了。他們在殘害着怎樣的人才呀！」

（《原上草》第三一頁）

譚天榮的訪問雷海宗先生的事非其虛構，《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七版，刊登着記者鍾林的報道文章《南開大學反擊右派的鬥爭》，其中記曰：

「雷先生說：『青年人們找我，我當然是要接待的。談到黑格爾的哲學，我問譚天榮：你讀過黑格爾的哪些書？他說唯讀過中國翻譯過來的幾本書中的一部分。我問他你能讀外文書嗎？他說不能。我問他向北大對黑格爾哲學很有研究的賀麟先生請教過嗎？他說沒有。我勸他：你要想學哲學，要研究黑格爾，你至少得學會外文，熟讀黑格爾的所有著作，也可以找賀麟先生談談。哲學是一門系統的全面的對世界對社會歷史的解釋的高深的學問，不要把它看得那麼簡單。』」

「雷先生對大家說：『我是學歷史的，但對於最唯心的、深奧的哲學也讀過一些，我感到這些哲學都有階級性，都在企圖說明世界。但對譚天榮的大作則沒有這種感覺，而只感到為難，因為它

只是名詞概念的堆積，沒有說出任何問題。」

雷先生的講述，深刻而真實地評價了譚天榮「論著」的水平。茲不詳述。

幾乎與「第二戰場」同步，「第三戰場」又踵之而至：這就是物理系三年級學生劉奇弟的大字報《白毛女申冤》及數學系三年級四同學的《自由論壇》的出現。

所以稱爲「戰場」，是由於只要有逆耳驚目的大字報貼出，貼報人未及旋踵，立即便會有一群「鬥士」擁來，於是「爭論」！實際上就是「圍剿小分队」，他們不會受命，而是源自本能的主動，扮演的是「校園憲兵」或「學校巡捕」的角色，哪裏出現「反黨分子」，那裏就是他們「捍衛真理」的理想舞台！所以，所謂「反右派鬥爭」，在北京大學乃是與「右派」學生駢至，六月八日以前，似乎還以「個體」、「私營」的面目出現，六月八日以後，則是理直氣壯的官方行爲，已不再僅僅是一種「本能」，而是一種「受命之舉」，「戰場」，當然也就不再分成「一、二」，而是「全國一盤棋」的全局之殲。

「白毛女」是一個理科學生所能想到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典型，這裏的「申冤」是一個「比興手法」。劉奇弟在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中曾被審查與批鬥，以至傳訊與拘押，所織罪狀不過是青年學生日常牢騷而已，拘押半載，竟是「查無實據」，故「寬大處理，不予處分」。事情是本無罪行，受冤被捕，他的「釋放」，屬於錯捕後的恢復自由，談什麼「寬大」云云，豈非狡辯！劉奇弟當然不滿，於是以「白毛女」自居申述冤情。申冤未久，想到「肅反運動」之緣起，於是又寫大字報，赫然的橫幅標題是：《胡風絕對不是反革命》，其左右還有對聯一副，文爲：「鐵窗鎖賢良，天昏地暗；忠臣血灑地，鬼哭神嚎。」如此大膽

的話語其效應當然強烈。否定肅反已越出當時整風所要反對的「三個主義」（又稱「三害」），毫無疑義，這已非僅「右派言論」，而是非常「惡毒」的「反革命行爲」！於是便立即被定性爲「是一起非常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他當然就是「反革命分子」。於是他在「五·一九」之後僅幾日，便淪爲比「右派」還要不幸的賤民，待到「反右派鬥爭」後期，不論在校園何處，只要被人認出，只要呼其名而指其人，若獾狐之露於市，便會立即形成群截圍打的場面。他本瘦弱，不堪一擊，常被打翻於地，抱頭蜷局、輾轉翻滾於足履踐踏之下，直到鮮血瀝頤，鼠竄而去！

他在處理「右派」的文件下達之前便被秘密逮捕，判刑十五年，流放於黑龍江興凱湖勞改農場。寒酷飢餓，力盡筋折，未歷幾載，距刑限尙遙之時，在一個禁閉「小號」（長一點五米、寬零點八米、高一米的狹小囚室）裏凍餓衰竭而死，其時年不及而立，家唯老母，遙在湘潭，迢迢萬里，難往認領，其遺體乃被棄於冰雪之中，凍土之下。

與人擊節而誦曰：

生於龍之鄉，死於龍之江，

孤魂家萬里，白髮空斷腸！

三、最初的論戰

就交往而言，馬嘶、李亞白、沈澤宜堪為我的文友，我們匆匆商定：辦一個「牆頭詩」式的壁報，命名為《廣場》。一切皆極匆匆甚至失於草率，草率到近乎粗製濫造：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一張約兩平方米的毛筆小字壁報便悄然張貼於16齋東門外的牆上。因為「整風」所反「三害」之一「官僚主義」，我們便以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名言：「我真想像狼一樣地吃掉官僚主義」為大字橫幅，貼於壁報之上端，望之赫然入目。

於是，禍乃天降！其日黃昏，當我與李亞白、沈澤宜行經這張壁報之下時，稍一停步，便有三三兩兩鬻事者趨前圍攏，於是一場面對面的口戰便由質問、問難漸至爭吵及吵鬥！——這就是那一群以「衛道」為己任的學生們的最初登場！

我們面臨的是一場「三對群」的短兵之接，也是一次出乎意外地「誤中伏區」，我們扮演的幾乎是語無倫次的答不勝問，總之，此時我們面對的不是昔日洋溢於燕園中的友情之笑，而是充血而視的怒目與憤不擇言的惡言！

於是，圍觀者也蜂擁如堵。我們面臨的質問就是：「北京大學哪裏有官僚主義？你們要像狼一樣吃掉誰？」

這樣的質問使我忽憶起剛剛發生的學生自殺的慘劇：

在此前數日的一個下午，一位年近三十歲的男同學自哲學樓二樓之大階梯教室的西南後窗口自墜！以頭觸地，顛裂殞命！這就是我的同班同學黃必達。

他是「調幹生」，似是河南人，家有妻室，家境貧寒。學校體檢發現他患了肺結核，似已晚期。在五十年代，肺結核極似今日之癌，一經確診，便如判死，故他悲觀之極，終自輕生。他是共產黨員，在五十年代的政治話語裏，自殺便是逃兵、便是叛變革命！尤其是共產黨員之自殺，罪在不赦。因之，黃必達之死，從其時至於今日竟無一人作一同情語，人之無情，乃至如此！

我聞此耗奔往觀之，已移屍於校醫院，唯見滿地鮮血，赤稠如漆，令人驚駭之極！而後數日之間未嘗聞系、級、班對此置一語，亦無人置之於齒頰，清風朗月，似太平無事！後又數日，五七年之春季，北京流感肆虐，我亦未倖免而入校醫院求診，時為晚間八時許，行經走廊一閑室之門外，無意側視，乃見昏燈之下地上置一擔架，黃必達僵臥於其上，四肢向天伸起而蜷曲，獐目張口，為墜地凶死瞬間之體態，竟未蓋一布幔，亦無一人守望。我猝然見之，驚怖之極，未暇就診即踉蹌而返，如此慘狀，即令今日仍在視間！

而後漸聞傳言云：事已理畢，黃必達終以「自殺叛黨者」之罪名，論列了之！

四十七年過去了，對於自殺行為的認識也趨於公正：人情味濃了一些，階級論已退於三舍，昔非今比！我因親睹那淋漓的鮮血，常悲思那慘澹的人生，故心中的那一份驚駭與那一點憐憫，迄今未泯！但這「驚駭」與「憐憫」在一九五七年的當時是沒有市場的，也會被納入到「同情自殺者」的罪愆當中去！

我曾想：人之輕生，自是以為死比生好，革命大家庭的溫暖與黨的關懷，難道竟感化、拯救不了這個

「自私者」的「叛變」的靈魂？置黨的利益於不顧、置妻兒的休戚於不顧、置身為北大學生的光明未來於不顧，而毅然一墜！如果「大家庭」中真地多一份關懷、多一份溫暖、多一份耐心（據知情者言：他的自殺動機「組織」知之已久），那麼，此處我還要說：不妨再多一份「監護」——是否可以不使那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裏失去一位階級弟兄？尤其並非是在槍林彈雨中或敵人的刑場上，這犧牲本是可以避免的！或然曰：假如他不是一個貧苦農民出身的黨員，而是一位「貴胄」，譬如：是黨委書記的兒子（這「譬如」，在當時是最不被容忍的，是捅了馬蜂窩！）他會被如此棄屍閉室而無人置顧嗎？而且似乎也不至於心靈會如此地崩潰、如此地無所依傍而自屠一快！

這憤慨，其實久蓄胸中，終於在五月二十一日黃昏，在16齋東門外的空地上，面對怒目與追究，我竟未三思繼之而言，所以言此，是因為我理解為這慘劇應與當時的「反官僚主義」的話題有關。既久知他已心懷死志，為什麼不把此當作「重點的重點」的大事去防範？「人命關天！」這個連愚夫愚婦都知道的通俗道理，為什麼在號稱「道德文化皆屬一流、人文科學皆冠中西」的北京大學裏，竟無一人為其評說？頗似不值一說！

但，後來終於有人「評說」了，那就是在那個「辯論會」上，他們是用吼叫「告訴」我的：「告訴你，張元勳，你知道嗎？黨對黃必達不是沒有教育的，從校黨委到系總支都對他談過話，他是被醫生判了死刑的人，悲觀厭世，才用自殺自絕於革命、自絕於黨和人民！」

尤有甚者，又有第二個人「告訴」我：「告訴你，這是黨的事情，與你何干？你算老幾？」

原來如此！我終於大悟！此誠如「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韓非子·說林上》）多

問，自古屬傻！

「你算老幾？與你何干？」這八字箴言，四十七年來在我的耳際一直作金石之聲！那古老的金人背上的銘文其實就是對此類訓誡的默認！

寡不敵衆，尤其是意外陷阱，我們當然是失敗者！可以說是一敗塗地！

這是北京大學「五·一九」學生民主運動伊始的首次交鋒！

但，豈知更大的鬥爭尚在後頭！

在次日（五月二十二日）黃昏，也是在這16齋的東門外，一個早已設就的「辯論會」待我久矣！我與馬嘶並無思想準備地路過於此，竟如誤入伏兵之陣而身陷重圍，環顧之間，我認出待此圍殲者儘是我的同級、同班之同窗，而且皆是黨員以及班幹部之類，不過也有例外，其中我也認出竟有我的中學時代的「學兄」丁××在焉！

這是一個有充分準備、有組織的「辯論會」，更確切地說就是專為找我吵架而來的！他們一群，我只一個：是一次「群對一」的圍獵之戰！話題仍就「黃必達之死」說起。他們於是當眾輪番講述這個「可恥的自殺者」的死，講述這個在「關懷」中的「叛黨行為」，幾個人的十分雷同的講述，使聽者逐漸明白他們所奉的主要旨意唯在「關謠」，是「肅清影響」。所以，他們先發制人地齊聲質問我：「為什麼造謠？」

「造謠」？把明明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自殺，血跡猶存，硬要強說成是子虛烏有！最好由我招認「本無此事，是我捏造」為佳，但我偏偏沒有枉己適彼，遂令之如怒蛙群噪，氣急之極！我當時其實不解：講述一個黨員的自殺何以竟會致此大波？

那是一個極悶熱的夜晚，在北大16齋東門外的馬路上的這一場「口戰」進行得愈演愈烈，大約百米方圓之地全是人，夜色濃黑，「聞其聲不見其人」，發言者站的是飯廳的餐桌，無需階梯，一抬腿便可邁上，講畢，一步便可跳下，幾經上下，怒語頓足，呼講者言未盡而桌毀仆地，於是第二張餐桌又繼而用之，據餐廳管理員說，那一夜十餘張餐桌報廢。

那是一個難忘的夜晚，三天來的文字交鋒激化成當面相稽，那一夜，已經形成了「群體圍殲」的「反右派鬥爭」大會，所謂「群體」是說一群後來標榜自己是「左派」的人，此時已集中火力向「右派言論」反擊，一些發言已提到「大字報中的話是反革命煽動」的嚴肅話題，開後來「扣帽子」之先河，而當時的我，就正處於如此出手不凡的猛烈的火力的焦點。正當「群體力量」前呼後應，輪番討伐之時，一個女學生在濃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那夾雜着婀娜的蘇州方言的普通話，音色渾厚，不似女孩慣有的嬌柔，在震耳欲聾、聲嘶力竭的此前的男聲叫嚷的未絕餘音之際裏忽然傳來如此迷人的聲音，頗有「一洗萬古凡馬空」的新意，沸騰喧鬧的聽眾頓時化作悄然。

「我們不是號召黨外的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張元勳說吧，他不是黨員，連個團員也不是，他寫了那麼一首詩，就值得這些人的這麼惱怒、群起而攻之嗎？今晚在這兒群體討伐的小分隊個個我都認識！所以，自整風以來我一直沒有說話，也沒有寫過什麼，為什麼？我料到：一旦說話也就會遭到像今晚這樣的討伐！我一直覺得組織性與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誰？」一聲怒吼從夜色中的人群中咆哮而出，打斷了她的發言，這顯然是一位陌生者，其實凡熟

悉她的人憑着她的聲音就勿庸再問。

「我是林昭！怎麼？你又是誰？竟是如此擺出一個審訊者的腔調！你記下來！『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她稍停，又說：

「告訴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今天既然來了，也就沒有那麼多的功夫去考慮那麼多的事！你是誰？還是你們是誰？你怎麼不敢也報報你的家門？」

林昭語音未盡，夜色裏的人群中有人高喊：

「他們是派來的！」

「他們想來打群架，問問他們是誰派來的？」

「跳樓自殺，這是真事，不是造謠！張元勳沒說錯！」

一片掌聲。



林昭與同學趙雷（前左四）等，一九五五年攝於天壇回音壁門前。

一個人跳上桌子，他喊：

「同學們，大家聽出來了嗎？前面的這一幫子人是一夥的，一個人死了，一條人命，在他們的嘴裏那是輕如鴻毛、不值得一提的！最主要的是：不應該拿黨委書記作比喻，不應該說『假如是黨委書記的兒子死了，是否也會如此地視若草芥？』張元勳的最大『錯誤』就在這裏！這叫『太歲頭上動土』！所以這一群『馴服工具』都來充當『工具』了！其實這樣的事還少嗎？人民和公僕的倒置還稀奇嗎？令人稀奇的是：今晚的這群人竟拉幫結夥地在這兒對一個人的群集圍攻，他們也不覺得害臊嗎？」

這個小個子的身影在星空閃爍的夜色中憤激，他那明顯的浙江餘杭韻味的普通話柔中蓄剛。九年後，在河北省渤海灣的一個勞改農場裏，在與一位北大老友的夜晚中，才知道他就是那個星夜發言人，他就是後來被殺的西語系學生顧文選。

他的發言代表了那一夕被那幫蓄謀圍攻者的猖獗而深深激怒了的現場聽眾的共識，當他高聲呼喊「他們也不覺得害臊嗎」的時候，全場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

在此群情憤激的時刻，一個彪形大漢自人群的遠處擠向那發言的桌子，而且邊擠近邊喊：「我來說，我來說！」他身材高大，雄健魁偉，腿只一抬，似乎毫不費力地便登而立之，其夜無月，即使夜色濃暗，由於他那偉岸之軀及一口山東聊城土音，便使人立即辨出君是阿誰！他當然也是那群中之一員，會場稍靜，他即發言，非常出人之料，他一改此前的快語疾言，而是拖着悠長的腔韻似在吟誦，而且他的開場白就有點「石破天驚」：

「我不會講普通話——

我沒有在這種場合講過話——

今天我要用我的鄉音——來講話——

我是一個共產黨員——」

開始的三句皆以「話」為韻，是名副其實的「三句話」。但，這不是詩歌吟誦會，如此跡近矯情的發言，聽來頗為可笑與酸迂，早已把所有的聽者的耐心損蝕淨盡。

有一個人大喊：「賣弄什麼？誰聽你打呼嚕？」

又有人大喊：「別讓他講！別讓他講！」

「滾下去！」

一片眾聲怒斥。桌子周圍人影糾亂，那大漢便被幾個人推下桌子，跟着便是斥罵與笑聲。他欲扭轉那出乎他們意料的「逆流」，終末如願！

那大漢消失在這夜深深時，那大漢消失在這昏昏昏時！

「鄉音」，我忽然想起就在半個月前，《紅樓》第三期刊登的那一串「組詩」，總名《鄉音》，（我記得這其實是摹仿自李季的一首長詩之篇名）其開篇之語為：

土裏爬來泥裏滾，

粗糠野菜餵成人，

苦去甜來不忘本，

走遍天下愛鄉音。

這裏講述的（在那個年代更確切地說是「炫耀的」）是他的貧窮的雇農出身，在其時，訴苦述窮皆是無尚榮光，意味着他是「執政一族」（大有「八旗」之於大清的豪情之狀於其間）。這位自行「束脩」而「投鐻從戎」者，身經萬戰，而後從「工農速中」未經考試、保送來到北大中文系就讀的共產黨員，對他的非凡的過去之自豪是可以理解的，凡與人語，動輒述之，如數家珍，這與「老子抗戰八年」、「老子三代長工」、「老子大字不識一個」的自豪感同是一代豪言！這「土裏泥裏」、「粗糠野菜」、「苦去甜來」的榮華家史，在千萬次「控訴會」、「鬥爭會」、「憶苦思甜會」上同文而歌，濡耳欲聾！如此美言，常常是擊垮頑敵的萬能靈咒與喚起眾哀的神妙天歌。此處尤以「不忘本」之情最為高貴，亦即據說來自那句「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的「震世之言」！這裏是把「愛鄉音」當作「不忘本」的「標誌」的，反之，那些走進京城便棄絕「鄉音」而操起普通話的人自應判作「忘本」之徒！這就是他登場便榮稱他「不會講普通話」的心理底蘊。（難怪，在北大中文系的講堂上，由周祖謨教授主講的必修課《現代漢語》的課程裏，講普通話是作為必修之業，而這位「愛鄉音」者竟恬然以「不會」為榮！直到今天也不會！）所以，他講什麼「我要用我的鄉音來講話」的時候，令人大惑不解，其實他已進入角色，蘊含着的是那種強烈的「不忘本」的、「憶苦思甜」的、對地主惡霸鬥爭會的控訴情懷！但這些情感無人理會，他終於曲高和寡般地在「歎無知音賞」的呵斥之聲中滾下台去！

漸至午夜。但此處似無夜闌，當「鄉音」竄失，人群裏發出一聲古怪的吶喊：「我來講！」夜色中，一個矮小的人影蠕動般地爬上桌子，憑藉星空的天光，可看到即令如此悶熱的夏夜，其人卻戴着一頂「解放帽」，帽沿下的眼鏡在他搖動腦袋的瞬間熠熠閃光！他那一口極為難懂的湘潭土語伴之以拖長的腔調，令人

立即聯想到長征途中的那些動員鼓動的不朽之詞！「同志們——！那中國大地上對眾呼喚的慣語，在他的悠揚的吶喊裏，聽來極似「橈子們」！人群裏頓時發出一片笑聲。

但，忽然有人喊：「他是龍英華！他是龍英華！」

「對——！我就是——湘潭土民龍英華！」

又一個以「土」自豪者！「華」，聽來極似「蛙」。他講的才是當時最為驚人的「鄉音」，連帝國主義都聞之蹙眉，但不知為什麼他竟未作炫耀！

「聽不懂你說些什麼！」黑暗中有人喊。其聲未絕，忽然一人跳上桌子，與龍英華比肩而立，喊道：「我是劉奇弟，我是湘潭人，我來翻譯！」於是一人講之，一人譯之，猶如學舌，又似相聲演員的精彩絕倫的演出，遂令全場爆發出大笑之聲。

「我是哲學系的龍英華，全校第二張大字報是我寫的！」

他那一口最本色的、極富煽動力量的湘音，聽來令人似久諳其聲！他那凌厲的憤慨之聲在北京大學迷茫的五月之夜色裏悠遠地迴蕩，也許是展現了這個方音的神威般的功效，那憤激難息的嘶喊與吵鬥均化作一片靜穆，感受着這個身軀瘦小、土裏土氣、一介鄉民般的南方小子所抒發的憂憤之中又夾雜着的感人至深的無限悲愴！他的語調越拖越長，慢條斯理，不慌不忙：「黨內的——馬克思主義者——太少嘍！太少嘍！黨外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多哦！很多哦……」

「你這個共產黨員，說的是什麼話？」聽眾中一人吶喊，打斷了他的話。

「對、嘍——」語韻拖得更長：「我是共、產、黨、員——，所以——我要、講——！」

一個人跳上桌子制止龍英華講話，並揭發說：「龍英華這個黨員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他想退出共產黨，另成立一個社會民主黨……」此時桌子上已是三人鼎立，其人頓足，桌子已不堪其重，四腿歪斜及地，三人俱仆而下，全場大亂，語聲噪聒。未久，又一張餐桌自大餐廳搬至。對面的27齋是一座四層宿舍樓，住文科女生，其時雖已夜深，但全樓室內燈光通明，窗戶大開，每個窗口皆趴滿女學生，靜靜地觀賞着這一場星夜的口戰！

龍英華在夜色中消失了，他的信仰的崩潰亦如他而後的沉落一樣，是因果並至的「雙星」。他「沉沒」了二十三年，一九八〇年之春，朔風似刀，燕雪如鹽，在北京為林昭舉行的追悼大會上他竟意外地出現，那時他已是頗有老態，懸鵝百結，羸膝履蹠，形容枯槁，但他那濃醇未改的方音在悼懷林昭的講演中悲愴地迴蕩！在那寬敞的大廳裏繞梁與和鳴，那飾於四壁的白紙墨蹟的輓聯及松柏森森的花圈都似在顫動與作響！那一張列為北京大學一九五七年「五·一九」學生民主運動的「第二聲槍聲」的十六開白紙，使這個「湘潭土民」在人群社會裏消失了二十三載，他寫踏吳地、笠戴楚天、孤雲野鶴般地在出世的孑然孤獨中遨遊與飄零！令人想到，正是由於那一場「風雨」，使他終化作人群利祿場外的幽靈，遊離與無蹤似乎凝成了這個不幸的生命的意義。對於那次「風雨」中的冒險者們其下場似乎不外二途：或殞身法網，於「恢恢」中損蝕而終；或逸於「網」外，於「天天」中耐此曠世的孤獨與寂寞。龍英華當屬「後者」之範！

這天夜間，林昭在未名湖畔的茫茫夜色中向我說：「這或者是一個悲壯的祭日！這或者是一個悲壯的祭壇！這或者是一個悲壯的犧牲！或者會流血！但願不流血！」

從此，她不再如昔地凌厲，什麼話也不說，什麼文也不寫，每日仍在那塵封似鐵、霉味可人的善本書庫裏靜讀，這反常還應以五月二十二日的茫茫之夜的浩歎為起點。據說她一直僵卧了兩天才坐起來，在桌上的一張破紙上順手寫下了十二個字，即：「天之杌我，如不我克！此責其誰？」前兩句她引用的是《詩經·小雅·正月》的詩句。

其實，她僵卧如死的時候卻有人並不肯放過她！她發言的次日，那首《我們的歌》的「首席」署名者江楓就寫了一張大字報詩，題名《致林昭同志》，她開始被置於「左」的火力之下，毫無疑問，這一張來之有自的大字報詩，宣告了林昭的厄運的開始。

未久，江楓又寫了另一張大字報詩，如下：

向左！

向左！！

向左！！！！

沿着「五四」的道路

應着時代的怒吼

年輕的共產主義者

守緊

共和國

每一座窗口